



## 向西方教士進一言

陳尹瑩

（按：本年五月十八日，作者以天主教代表身份出席美國基督教全國協會中國分會，於紐約州主辦的中國諮詢會議。與會者均為在美國研究中國教會問題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代表。作者應邀以「從海外華人經驗看中國的需要」為題，發表演講，以下為講辭中譯全文。）

不久之前，一位德籍神父來紐約州探望我，當時我是香港天主教教區視聽中心的海外監製，在紐約為香港教區製作幻燈教材，其中經費，均由這位神父向德國教會籌募。部份捐款用作在中國聘請藝術家，叫他用近代及傳統手法，描繪聖經故事，以製幻燈片。他當然對製作的進展很關心，我告訴他一個好消息說：「我們聘請的藝術家已由中國大陸移居到香港了，以後不但他能更方便的替我們作畫，更有機會觀摩海外藝術家的畫風，這樣他的作品一定更有進步了。」我的德國朋友向我定睛一望，滿臉失望的神情說：「那麼我們還會繼續聘請他嗎？」這一下子，我倒驚奇起來，便說：「無論他住在那裏，他還不是同一個人嗎？」他說：「是的，不過他不再住在中國啊！」由於我們是好朋友，所以忍不住偷擲他一下：「那麼你要我把他送回中國去，再做一個地道的的中國人嗎？」他笑着說：「不，如果我能告訴捐款的人，說這些善款是用來聘請住在中國大陸的藝術家

，那就好聽得多了，中國嘛，多神秘多浪漫，說起來特別不同呢？」我啼笑皆非的看着他，他也一聲不响的望着我，也許心裏正想着詩人KIPLING的名言：「東是東，西是西，兩者永遠沒有溝通的日子。」我可沒有這份詩意，只在心裏咕嚕地說：「這真是像廣東俗語所謂『鷄與鴨講話』」。

今天胡仲揚博士請我以「從海外華人經驗看中國的需要」為題，向熱衷協助中國教會的西方人士講幾句話。我第一個反應是：「西方朋友想聽什麼呢？」這是一個很中國化的反應：第一，設法遷就實際的情況；第二，承認東西方人士擁有不同的心態，使東西方人士興奮，喜悅，難堪或激憤的是不盡相同的事物。誠然，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一起分享主耶穌的寶藏，但是保祿宗徒下過警告說：「我們把這寶藏盛在現世可朽腐的器皿裏。」依此而言，你們的器皿顯然是用西方的胚子造成；而我們呢，却是如假包換的中國貨。像我們僑居海外的中國人，對東西方異同之處，也許比其他人的感受要深得多；說起來，這真是一個矛盾：我們越去瞭解西方社會的一切，就越覺得自己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所以我想要一個像我一般，在東西兩地生活過及接受過教育的人，在研究中國教會問題的會議上，和與會者分享一些意見的話，我膽敢希望在研究今日中國的物質需要之前，先令東西方人士明瞭兩者不同的地方，藉此建立導致更深一層的了解，進一步到達密切聯繫的境界。

當我反省我和這位德國朋友的交往時，我覺察到我們一起生活在同一的西方社會（他是個修會修士兼傳教士），我們的世界觀基本上不同。他學習時，運用邏輯方法去追尋理性上的解釋，他很熱衷地去尋求社會的進步。他把歷史看成人類掌握現在發展將來的過程，是永不鬆懈地邁進的產品。他對宗教事務也非常科學化，事事有條不紊，天天精力充沛地去苦幹。當他唸到福音裏主耶穌給宗徒傳福音的使命——「去走遍世界每一個角落，使一切國度都成為我的信徒。」他就覺得這是對自己的挑戰，決心要以主的名去征服世界；他從來沒有想過，世界上有些人，對他那種懾人的傳教狂熱，那份秘而不宣的優越感會產生抗拒。不過我又知道他是個正人君子，慷慨大方，真心的關懷別人；熱誠地助人之後，不希冀任何酬報。在他身上我又覺察到西方個人主義使他性格獨立而有見地，但同時也使他內心非常孤寂。

在中國人看起來，這個德籍友人有時顯得不可思議。中國人不喜歡以邏輯推理，也不喜歡以科學觀點以及運用一大堆理由向世界挑戰，我們待人接物，通常以人與人間的關係做準則，中國人從呱呱墮地之日起，就在人倫關係綜錯複雜的

社會中長大，我們一生要追求的不是自我，而是尋求對己、對人、對天關係的和諧，我們不在乎去征服，而悉心於使這種複雜的人倫關係到達臻善的地步。歷史為我而言。並非通過時間，直向將來的一系列的長征，我們相信歷史隨着大自然的韻律，循環不息；夜盡就是天明，冬去跟着是春來，歷史也有自己的週期，春秋交替，國祚是如此，個人的際遇莫不如此；過去，現在和將來，輪轉交替，不可分割；社會的盛衰，個人的禍福，都有自己它們交替出現的時候。所以世世代代的中國人縱然受盡多少苦痛，都懂得堅忍之道，而懷着樂觀的態度去忍受一切，因為我們深信「苦盡甘來」這個道理。這樣也能解釋何以中國人對自己獨特的身份懷有很高的警覺。因為縱然一生平凡短促，但我們每個人都背負着長遠的民族歷史。歷史教訓為我們是重要不過的。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份中文報刊的社論，談及皇后大道的交通擠塞問題，它這樣寫着：「宋代皇城也曾出現過同樣的問題，當時的朝議大夫，也作過同樣的建議。」宋朝雖已覆亡了好幾百年，但它仍活在我們這個東南亞的國際大都會中呢！

在那位德籍友人而言，這位國籍的藝術家，一踏出國界進入香港以後，他不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了，他立刻失却了中國人擁有的那份神秘感，而變成分佈在天涯海角千千萬萬克苦耐勞，沉默溫順的海外華人之一，我們絕少聽到他們高聲吶喊，在僑居地爭取應有的權利。也許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的一群，在中國人而言，不論任何政府，什麼主義，有形無形的國界，籍着出生或申請得來的公民權，都不能改變一個事實：他們仍舊是中國人。我們是一個很務實的民族，為了生活的方便，實際的需要，我們個人能順應環境的要求而隸屬另一個國家，甚至會很熱衷地使生活很現代化，可是這種「西化」的過程是很表面的。骨子裡我們仍保有中國人的味道。

在海外僑胞而言，這種跟祖國鄉土憂戚相關的感覺，在過去三十年從來沒有中斷過，甚至在最困難的日子裏，我們依然設法互通音訊，原因很簡單，我們對親人的關心和責任不單超越領域，不因地方而改變，跟他關係密切的親人分佈在海內外各地，所以，祖國的急需，就是寰宇之內每一個中國人的急需，到了今天我們才能有機會以具體的方式，表達這種深藏不露的感情吧！

自從中美建交後，西方人興奮的期望着歷史能展開新的一頁，當然西方人對中國大陸之開放，懷着興奮之情時，他們期待中國裏總有些改變以及產生一些新事物，這點在某些程度上，他們是對的，但從我們這方面去看，我們深知事物不會有大的變化，祖國仍舊是一塊擁有綿綉河山的土地，家鄉仍是老樣子，同胞仍

是至親骨肉，還有這種從來不因任何事而變化的人際關係，帶給每一個中國人對自己同胞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仍然存在。西方友人往往這樣問道：「現在中國門戶開放了，你爲國家作過什麼貢獻呢？」得來的通常是非常尷尬的「沒有」二字。在你們看來，似乎我們毫無愛國熱情，可是這個對祖國沒有什麼貢獻的人，在他只有一廳一房的屋子裏，除了自己的一家六口之外，還收留了剛從大陸來的遠房親戚，這位帶着一家四口的親戚，就寄住在他的客廳裏。他可能只在一家餐館當侍應生，一週要辛勞工作六天，然而他也騰出一點時間，四處奔跑爲這位親戚找份差事，幫助他的子女入學，他對親戚這樣慷慨，並不一定像你們的傳教士一樣，基於一種悲天憫人，濟世爲懷的心。因爲他是中國人，他就對親戚朋友產生一份必需承擔的責任，他鼎力襄助在前，他的親戚未必會感恩圖報於後，這點不要緊，也許這些親戚輩可能貪得無厭，使他煩厭至極，但是人與人之間既有了這般深厚的關係，也就帶給他無可推卸的責任。倘若這種關係消失，那麼他的生命隨即失去意義。對祖國，他不因過去的三十年中因竹幕低垂而覺得與親人相隔萬里，他們也不談贊同或反對某種政權，他們所背負的是幾千年的文化，因此三十年爲他們不算得什麼。目前的政治分裂和爭執，就是說我們的歷史進入了低潮，到底春秋總會交替，祖國總會找到休養生息的辦法，當我們的歷史步入嚴冬階段時，每個中國人都分擔它的苦寒，肅冽和死寂。因此受點痛苦是平民百姓的家常便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讓他三十年來素未謀面的遠親到家裏寄住，就是對家國盡己所去表達一點愛心的最好方法。

有些西方傳教士認爲，既然中國人擁有極吻合基督精神的傳統美德，從而對人生哲理有那麼具體的表達，今日的中國青年又對精神生活有那麼深的渴求，假若中國又擁有民主政體，絕對的宗教自由；西方傳教士又絲毫不受限制地予以援助，好使西方教會能大量供應宗教書籍及傳教人手，那麼基督信仰會不會像雨後春筍般蓬勃呢？這真是妙想天開，實際上，在中國基督信仰只是宗教事務中的一個環節，而宗教事務部隸屬國務院，是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的一小部份。況且，要將個人的宗教思想傳給他人，使他也心悅誠服地接納，並改變自己的人生觀，這是一種純粹由西方而來的觀念。中國的人倫關係固然複雜，一個中國人的外在行動往往被微妙的人倫關係所左右；宗教信仰却純粹是私人問題，絕少沾上人際關係，我們有點不明白爲何與我們痛癢無關的西方人，不單希望我們了解他的宗教信仰，還要我們全盤的接受呢？我們也許得承認中國人從來沒有經歷過西方人的「自由」，可是中國人向來就享有宗教自由，除非那宗教以政治組織的形

式出現，又如一般人指摘基督信仰一樣，使信徒與中國社會隔離割裂他們的人際關係。因為在中國社會，再沒有比睦鄰更爲重要，假若上述表達宗教的方式引致如此不良效果的話，那麼宗教就變成破壞和諧的根由，那麼這怎叫中國人能信奉基督呢？中國若接受基督的信息的話，他們會像接受其他人生哲理一樣，不靠推理，但求心領神會，潛移默化，他們不因教義有邏輯，宗教對他有好處而加以接納，如果它能協助他在對己對人對天的關係上更臻完善就夠了，也許他不太明白爲什麼西方傳教士毫無條件的幫自己的忙，但他們深知一旦接受他們的幫助，就欠一下份友情，這份友情必需償還的，如果自己的領洗入教會令這西方朋友高興的話，他也會爲此而信教。

近日，我們之中有人忙於籌備今秋在加拿大舉行的中國問題會議，這次會議，將會有中國派的代表遠道參加，在座之中有人深感顧慮，由於參與這個會議的多半是西方人，他們擔心議程是否適合中國代表的口胃，他們期望的目標又是什麼？不適合怎辦？我個人的看法是：這種顧慮似乎言之成理，但不會是想像中那樣嚴重，中國代表以客人身份前來北美洲參加會議，事後又在美加各地訪問以期建立友好關係，他們所關注的就是友誼的建立，他們很想知道，能與西方友人建立什麼類型的關係呢？作了怎麼樣的溝通的呢？因此物質方面的款待，和環繞其他關係的「託詞」是極之次要的。假若主人請他們在整個探訪期間，前去觀看迪士尼的卡通電影，他們也許不以爲忤；我這樣說，並不表示中國代表不把主人放在眼內，更不是說主人所感興趣的事，在他們眼中毫無價值，任何人都切願他們與西方人的關係有進展而且到達和諧的境界，所以二者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比會談的內容更爲重要。

是的，中國人是一個很懂得妥協的民族，但是妥協委順並不等於屈服，讓我用以下的一個例子表達這個思想吧！一位美籍的友人認識一位國籍的老伯，這個老人家在年輕的時候，遵照父命回鄉相親，擺在面前的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因此他忙着點頭應許這門親事，翌年他興沖沖的回鄉迎親，婚禮過後，洞戶花燭夜時，他把新娘子的紅頭巾揭開一看，使他大吃一驚，原來親家竟然給他換上另一個其貌不揚的老小姐，那美籍朋友聽到這裏，不禁摩拳擦掌，爲老伯大抱不平說：「那麼，你怎辦啊？」那老人家從容的抽一口煙，慢吞吞的說：「遷就遷就啦！」在中國，妥協遷就是一門藝術，西方人誤以爲這是懦弱，以及不盡不實的表現。其實在利害衝突；綜錯複雜的情況下，它是保持和諧關係的不二法門。

所以，要談論中國的需要，我覺得還是先討論它和西方之間應建立起怎樣的

關係，幾百年前中國被迫和西方接觸，不旋踵大門又再關起來，因為它覺得這種接觸過程上所建的關係不妥當，希望找尋到更妥當的關係後才從頭開始，那麼中國要找尋的是什麼的關係？中國的傳統上有五種關係，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五倫。以性質而言，雙方平等關係的只有「朋友」的關係，其餘的都有它們一定的次序和等級，雙方不可以易位而處。父子，兄弟和夫婦是家族內的關係，而君臣（主僕，師生等）及朋友則算入社會關係；關係一旦建立了，不能隨意拆毀或磨滅；在我門下受業的學生，在若干年後縱然他也身為人師，又比我更為睿智，比我有更高的成就，但不管怎樣，他永遠是我的學生，我永遠是他的師長，所以西方傳教士帶着物質來資助中國，就與我們建起「施主」和「受佈施者」的不平等的關係，以後很難從這關係演變成平等的「朋友」關係。

再過一會兒，有兩位講者，（一位在華僑社會工作多年的宗教領袖，另一位剛從中國來美留學的青年），會依據他們的生活體驗，談談中國的需要。其實中國的需要很多，不是始自今天我們有所需，以往我們之間關係不太深厚，因此不便在人前承認有所需，這非要非常謙虛，才能承認我們確有不足而望援助，我們更怕一旦接受了施贈，我們就建立了永遠不能平等的關係，在這不平等關係裏，翻不過身來，以往我們放心不下，只怕在建立良好關係之先，就誤會重重，不能在種種矛盾和衝突之間取得妥協。我們又記起過去歷史教訓，不少捨己為人，懷着高尚情操的西方教士成爲侵略者利用的工具，爲我們帶來無限恥辱，而我們的官長和領袖也曾誤用殘酷手段去懲罰那真心熱愛中國的西方友人。最令我們放心不下的是二者之間民族性不同——我們兩者之間所關心的，渴求的，懼怕的，仰慕的事物都迥然有異，你們豐富的物資，高深的科技，不會使我們變成莫逆之交，因爲財富和權勢不能幫助你們明白我們的處境，所受的屈辱，所嚐的悲痛及面對的掙扎。

在這個尋求諒解及接納的過程中，我們深信如同在其他真理上一樣，真正的導師只有主耶穌一人，因爲我們的喜訊中心就是：主耶穌分嚐我們人性的軟弱，又成爲我們之中的一份子。歸根到底，真正使任何人學會同舟同濟，互相扶持的不是富貴榮華，而且一起接受我們人性上的軟弱和過失。所以當你們帶着豐盈的財富前來的時候，也把人性的弱點，失望，孤主無援，失去的理想，甚至褪了色的舊夢也一併帶來，也許我們在接受援助之餘，我們也能恕諒你們。禍福輪流轉，說不定將來有一天，你們歷史上的寒冬降臨時，希望在我們簡陋客廳的一角，你們找到棲身之所。